



印度文化余论

——《梵竺庐集》补编

金克木 / 著



學苑出版社



印度文化余论

——《梵竺庐集》补编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文化余论——《梵竺庐集》补编/金克木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8

(学苑文丛)

ISBN 7-5077-2025-X

I. 印… II. 金… III. 文化-研究-印度 IV. G1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0849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32 开本 7.125 印张 114 千字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学苑文丛》与《学苑学术论坛》已出文史方面的学术著作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文献学》、《诗经古义新证》、《中国家乐戏班》、《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汉唐封爵制度》等四十余种。

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

近十几年来，金克木先生以学术随笔蜚声国内。在金先生的笔下，古今中外、文史哲经、旧学新知，无不得心应手，触类旁通，挥洒自如。他的随笔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上，多家出版社竞相结集出版。金先生也对自己晚年转向随笔写作，又居然如此高产，颇感意外。但他认真一想，觉得自己一生读书做学问，其实是试图“破文化之谜”。“在信和疑之间翻腾，在热和冷之间动荡，过了70多年”，因而，“在生命的最后年月不得不将思想化为文字”。我们读金先生的学术随笔，应该抓住这个主旨。

金先生随笔的大多数读者也许并不知道金先生的学术本行是梵学，即使知道，大概也不会真切了解金先生的梵学成就。我是金先生的学生，愿意在这方面为大家做点介绍。为此，我写了这篇《梵竺庐集》读后感。

《梵竺庐集》是金先生的梵学成果结集，分作3卷：

* 这是黄宝生先生为金克木先生的《梵竺庐集》写的书评。本书是《梵竺庐集》的补编。为使读者对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有全面了解，故以此文作为本书代序。——编者

甲卷《梵语文学史》，乙卷《天竺诗文》，丙卷《梵佛探》。

正如可以用汉学指称中国学（Sinology），我们也可以用梵学指称印度学（Indology）。但梵语是印度古代通行语，因此，确切地说，梵学是指古典印度学。《梵竺庐集》中的论著和译作以古典印度学为主，也兼及现代印度学。

金先生与梵学结缘于其 20 世纪 40 年代的印度之行。1941 年，金先生经朋友周达夫介绍，到印度一家中文报纸当编辑。他在加尔各答与周达夫同住一室。周达夫当时在加尔各答大学研究院协助印度教授校刊《瑜伽师地论》梵本，沉浸在梵学研究中，故而为他俩的居室取名“梵竺庐”。金先生起初对这室名不以为然，因为他并无钻研梵典的意向。可是，出于好学深思的本性，凡事喜欢“由今溯古，追本求源”的金先生先拜师学习印度现代北方通行语印地语，而后不由自主地开始自学梵语。不久，金先生前往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一面阅读汉译佛藏，一面跟随印度著名学者侨赏弥（Dharmanand Kosambi）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此后，他曾跟随迦叶波法师学习《奥义书》，又曾协助戈克雷教授校刊《集论》梵本。从此，金先生走上梵学研究之路。《梵竺庐集》这个书名正是“纪念这长征开始时的一段因缘”。

1946 年，金先生返回祖国。回国后，他有志于写出两本书，一是印度哲学史，一是印度文学史。这在中国学术领域具有开创意义，因为一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始终局限于佛学。而佛学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也曾盛极一时，并在亚洲广为流布，但在印度国内并不属于主流文化，且已在 12 世纪消亡。印度古代的主流文化是婆罗门教（或称印度教）文化。19 世纪西方学者开创的印度学是对印度语言、历史、宗

教、文学和社会习俗的全面研究。由对印度梵语的研究，确认印欧语系，开创了比较语言学。由对印度宗教、神话和寓言故事的研究，开创了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文学。而 19 世纪中国学者忙于应对西学的挑战，无暇顾及印度学。长期以来，由于印度学知识在中国不普及，一般人士都沿袭古代高僧的说法，视印度为“佛国”，以为印度自古迄今是个佛教国家。

20 世纪，中国开拓梵学研究的先驱者是陈寅恪先生和汤用彤先生。陈寅恪先生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1919 - 1921）和德国柏林大学（1921 - 1924）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回国后，他主要将梵文和巴利文用于中国佛教史研究，包括佛经的翻译、佛教的传播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几乎与陈寅恪先生同时，汤用彤先生也在美国哈佛大学（1920 - 1922）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回国后，他也主要将梵文和巴利文用于中国佛教史研究，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汤先生率先突破中国梵学研究局限于佛学研究的传统，撰写了一部《印度哲学史略》。他还遍览汉文佛经，辑录了一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这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印度哲学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继陈寅恪和汤用彤之后，季羨林先生在德国哥廷根大学（1935 - 1945）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1960 年，他和金克木先生一起开设了梵文、巴利文班。两位先生共同开拓梵学研究领域，终于使中国的梵学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学研究。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季先生侧重研究佛典语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和梵语文学；金先生侧重研究梵语语言学、梵语文学、印度哲学和宗教。

在 20 世纪 60 年代，金先生除了在梵文、巴利文班上教授梵文外，还开讲《梵语文学史》课程，讲义列入

文科教材计划，于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梵语文学史》是中国梵语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与国外的同类著作相比，它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长处。它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将梵语文学的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中。对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和分析，采取“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但是，因印度古代历史本身的研究难度就很大，故采取这种写作方法绝非轻而易举。金先生为开辟梵语文学史的写作新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联想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屈指可数，更显出这部《梵语文学史》的难能可贵。

这部《梵语文学史》收在《梵竺庐集》的甲卷中。在甲卷中，还收有《古代印度文艺理论五篇》，是5种梵语诗学名著重要章节的译文。其中3篇于1965年首先发表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辑中，后又增译两篇，合成单行本《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作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之一，于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这5篇译文以及金先生撰写的引言，中国学术界才得以初步认识印度古代文艺理论的风貌。万事开头难。金先生在这5篇译文中确定了梵语诗学一些基本术语的译名，并在引言中介绍了梵语诗学的一些基本著作及其批评原理，为梵语诗学研究指出了门径。我后来正是沿着金先生指点的门径，深入探索梵语诗学宝藏，写出了一部《印度古典诗学》。

收入《梵竺庐集》乙卷中的梵语文学译作有《印度古诗选译》、迦梨陀娑的《云使》和伐致呵利的《三百咏》。《印度古诗选译》仿佛是提供梵语诗歌各种类型样品，如吠陀诗、史诗、格言诗和抒情诗，尝鼎一脔。《云使》是抒情长诗，能代表梵语抒情诗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个译本最初出版于1956年。该年，迦梨陀娑是世界和

平理事会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个译本和季羨林先生译的《沙恭达罗》（剧本）合为一集出版，作为“纪念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特印本”。伐致呵利的《三百咏》分作世道百咏、艳情百咏和离欲百咏。这是梵语“百咏体”诗歌中传诵最广的一部集子。金先生是译诗高手，这也不奇怪，因为金先生本人就是诗人，1936年就出版了新诗集《蝙蝠集》，后又出版新诗集《雨雪集》，最近又出版了新诗和旧诗合集《挂剑空垄》。我曾对照梵语原文读过《云使》译本，对金先生的翻译艺术由衷钦佩。这个译本可以列为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典范译品之一。只是国内的翻译理论家们不谙梵文，无法真切体认。我总惋惜金先生翻译的梵语诗歌不够多。梵语诗库中的一些珍品，惟有金先生这样的译笔才能胜任，也不至于辜负印度古代诗人的智慧和才华。

《印度古诗选译》中的《莎维德丽》是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著名插话。这篇译文最初发表在1954年的《译文》杂志上。1979年，金先生又译出《摩诃婆罗多》的楔子《蛇祭缘起》，并写了一篇剖析文章，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80年代初，季羨林先生翻译的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八册）陆续出版。这激发我的同学赵国华献身《摩诃婆罗多》翻译的决心。《摩诃婆罗多》卷帙浩繁，篇幅约为《罗摩衍那》的4倍。于是，先从翻译《摩诃婆罗多》的插话故事入手。由金先生领衔，开列篇目，赵国华与另外两位同学合作，译出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开始了《摩诃婆罗多》全书翻译的浩大工程。金先生亲自动笔翻译了前4章，为全书的翻译体例作了示范。译本第一卷于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不幸，赵国华于1991年英年早逝，未及见到这第一卷的出版。此后，这项翻译工程由我主持，现在翻译的

任务已经完成过半。可以有把握地说，印度两大史诗的翻译将在我们师生两代手中完成。

《梵竺庐集》丙卷是梵学研究单篇论文的结集，主要涉及梵语语言学、印度哲学和佛学。金先生在印度通晓梵文后，首先注重研究梵语语法学和印度哲学。1945年，他还在印度时，就已写出《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和《〈吠檀多精髓〉译述》两篇长文。《波你尼经》是大约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一部梵语语法著作，以近4000句经文，囊括了“复杂的梵语语法全部”。19世纪西方学者读到《波你尼经》时，无不惊叹印度古人的语言学天才。它早已被译成德文、英文和法文。金先生的这篇论文详细介绍了《波你尼经》的体例及其构建的语法体系。金先生在本卷的“自序”中，还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将《波你尼经》与中国的《易经》相比，认为“两书虽都以符号组成，但所蕴含及传达的信息和传达信息的方式彼此不同，而符号网络的构成及内含的思想根源却有相通之处”。他指出印度古人重语音，中国古人重文字，“一个是以声音为主的语词网络系统，一个是以形象为主的文字网络系统”。他还精辟地提示我们，这些“不仅是语言学问题，而且是语言哲学问题，又不仅是古代哲学问题而且是连贯下来的思想文化问题”。

吠檀多是印度古代的主要哲学派别。《吠檀多精髓》是一部通行的吠檀多哲学入门读物。金先生在《〈吠檀多精髓〉译述》中，也介绍了印度哲学概况，并从三个方面阐明印度古人“着重修行亲证”的思想特色：“一是修行以解脱为最上目标，二是解脱是超出生死轮回，三是轮回原于业报。”这是印度古代“一切哲理探索的出发点”。据此，我们得以理解印度古代哲学和宗教密不可分。换言之，“如此哲学化的宗教以及如

此宗教化的哲学也正是印度思想的特色”。

金先生从印度回国后，曾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教过两年半的印度哲学史，可惜没有留下讲义，后来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写一部印度哲学史的心愿。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篇深思熟虑的《印度哲学思想史设想》，对拟议中的印度哲学史的分期、篇目和需要着重探索的问题都做了提纲挈领的说明。他还提出要采取文献、文物和民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读解出其结构和意义，互相参照而发现其内在系统，才比较可以看出印度哲学思想的全貌”。

“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金先生的研究兴趣侧重在印度哲学思想方面。先是撰写了《〈蛙氏奥义书〉的神秘主义试析》和《古代印度唯物主义哲学管窥》，后又撰写了有关《梨俱吠陀》的一系列论文。

《梨俱吠陀》是印度哲学思想的源头。金先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印度上古时代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并将《梨俱吠陀》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易经》、《诗经》和《楚辞》）做比较。记得金先生也曾示意我可以考虑研究吠陀。但我发现《梨俱吠陀》这部印度最古老的诗集读解难度较大，其中不少词语在古代就已出现歧解，现代学者也是言人人殊。因此，我不敢轻易投身其中。不过，我相信吠陀文献是人类文化学的一座富矿，以后国内总会有学者沿着金先生开辟的路径进山探宝。

佛学是印度宗教和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且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金先生在这个时期也写了一组有关佛学研究的文章，总题目是《佛学谈原》。“谈原”是指谈论汉译佛经而追溯原本。汉译佛经的原本主要是梵语佛经。金先生指出：“汉语和梵语不仅是语言不同，还包含思想习惯在内，所以在东土发展后所著的佛教文献似是一事而有区别，仿佛欧化汉语或汉化欧语不等于

欧洲语。因此，我以为注意原本并非无益而有必要。”实际上，金先生提出了一个事关中国当代佛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应该加强对佛经梵语原典的研究。惟有追究原本，才能加深对汉文佛经的理解。同时，在准确理解文本的基础上，才能比较容易用现代思想和语言做出解说。金先生以鸠摩罗什的译经文体以及另外两部汉译佛经《楞伽经》和《心经》为实例，做了示范分析。回顾近代以来，对中国佛学研究做出贡献的陈寅恪、汤用彤和吕澂等先生都是通晓梵文和巴利文的。而近几十年来，国内佛学研究界鲜有通晓梵文和巴利文者。这种状况希望在 21 世纪能够得到改善。

《梵竺庐集》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梵学遗产。金先生一生的主要职业是教师，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直至大学教授。他擅长授业解惑，指点门径。他的论著也具有一种激发后来者参与研究的魅力，无形中起到“传薪火”的作用。因而，《梵竺庐集》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中国梵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更在于它对中国梵学的发展将会产生久远而深刻的积极影响。

引 言

我所生产的关于印度文化的书已合为《梵竺庐集》3卷出版，现在把另外的有关印度文化的10篇零散文章合成一集。

这里的10篇文中，3篇是关于佛教的，3篇是关于艺术的，2篇涉及政治，2篇述说文学，总之是谈论印度的文化思想。

这些文看来说的都是过去，甘地和两位泰戈尔也都是历史人物，可是论到的文化思想都与现在不无关联。读者如不怕费心思，可以自己由古向今推导。

文化思想的历史变化是不受任何个人意志强迫转移的，也不听从帝王、教主的任意指挥。该断的续不上，不该断的砍不倒。有时出现老招牌、旧商标下卖新货，有时出现老古董换上超新面貌，加上超新包装。佛教在出生地断绝了1000年，可是现在不仅在亚洲，而且据说在美国，在欧洲的英、德、法、意等国也陆续出现信佛、念经、修庙的人了。

力不从心，不能多写，这些话算是一点说明。

2000年2月23日

目 录

引 言(1)

从鉴真东渡传梵本谈起(1)

谈谈汉译佛教文献(9)

关于汉译佛教文献的编目、分类和解题(23)

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35)

印度画家阿·泰戈尔的美学思想略述(49)

印度的绘画六支和中国的绘画六法(89)

略论甘地在南非早期政治思想(97)

略论甘地之死(131)

《摩诃婆罗多插话选》序(153)

《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译文题记——略谈比较文学(177)

附: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181)

编后记(210)



从鉴真东渡传梵本谈起

鉴真和尚现在
是中日友好中的
著名古人了。
我想从有关他的
一件事谈起，谈
一些与他无关的
话；并不是想凑
热闹或押冷门，
只是读书有感提
供参考。

99 年以前，
即 1881 年，
英国牛津出

版了马克斯·穆勒校刊的《日本所得佛
教典籍》第一本，《金刚能断》即



鉴真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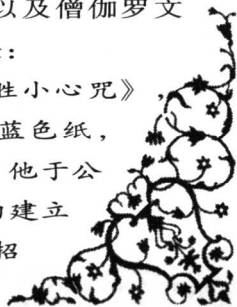
《金刚经》的梵文原本。前面有校者叙述获得几种梵本的经过。他先在 1879 年从日本得到《(小)阿弥陀经》，在 1880 年校刊于英国亚洲学会会刊，随即又得到这部《金刚经》和《心经》和唐朝义净的《梵语千字



鉴真东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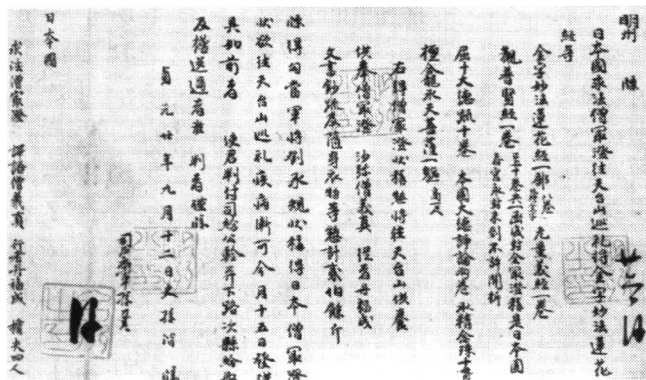
文》等等。还有日本收藏的用柬埔寨字母和缅甸字母书写于贝叶的巴利文佛经以及僧伽罗文片段等写本。在这篇文中有一段是：

短的陀罗尼，名为《尊胜小心咒》，是抄写本，原件为涂银的深蓝色纸，是著名的中国和尚鉴真所写，他于公元 753 年到日本，成为律宗的建立者。原件属鉴真所修建的唐招提寺，在大和的奈良。



后面列举日本所藏梵本时又有一段说：

唐招提寺，在大和的奈良；深蓝色纸，银字书写，其中有公元753年到日本建立这寺的鉴真所写的陀罗尼；由兼松和太田抄录来。还有些咒语也在同一卷写本中，没有抄来。



传教大师入唐求法牒

这是有关鉴真的两段话。此外还有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和尚将梵本传到日本的记载。

这部《金刚经》的校刊依据共有4个本子，在书中各附书影一张。一是直行，有悉昙字母的梵文原文，汉字译音，汉文直译，鸠摩罗什汉译，达磨笈多汉译，五种并列对照。二是只有梵文，与上一